



# 陶行知人口论初探

李世峰

**摘要** 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早在20世纪初他就指出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一生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注重实践,勇于探索,在充分调查研究分析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丰富成熟的人口思想。7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的人口论述和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办法措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显示出极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具有划时代的远见卓识。本文以大量详实史料介绍陶行知关于人口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试图引起有关方面对研究并实践陶行知人口论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 李世峰,1958年生,197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现任《安徽人口报》副总编辑。(安徽合肥 230031)

陶行知先生为了改造旧中国,改革传统教育,倡导文明生活,艰苦探索,百折不挠,努力实践,勇于创新,挥笔写下了许多重要论著,是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在他气势恢宏的精神宝库里,关于人口问题的重要论述,是我们认识人口历史、研究人口科学的发展、探索治理人口之路的宝贵教材。

陶行知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是较早在中国提出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学者。陶行知人口论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与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者的人口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陶行知人口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唤起民众的人口意识、忧患意识,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然而在旧中国,他的理想没能实现。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通过2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硕果累累、功勋卓著。陶行知先生的愿望变成了现实,陶先生的在天之灵得以告慰。但是教训我们应当记取。如果我们早一些、深刻一些、系统一些认识和实践陶行知的人口论,我们会少走弯路,成效更显著。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本文将介绍陶行知关于人口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和自己肤浅的认识,试图引起有关方面对研究并实践陶行

知人口论的关注和重视。

## 一、人口问题的拓荒者

为探索出路,陶行知刻苦学习,努力思考,深入调查了解民情国情,分析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早在1924年,他就洞察到人口多少与家庭贫富联在一起。他的一首《家穷子孙多》的诗生动地描述了人多受穷的可悲情景:穷家子孙多,睡觉抢被窝,吃饭打破锅,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1931年,陶行知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研究,以“何日平”的笔名,在《中华教育界》的“中国教育出路”专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以下简称《出路》)的长篇文章,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精辟的深刻的阐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多地少负担重是农民致贫的重要原因。他分析了一个有30亩地的自耕农,并指出“他的命运是跟着他孩子跑”。“如果他只有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了进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什么听天由命?他只是受他的生殖器官的指挥罢了。”

接着他又分析这个四口之家自耕农之将来:“看他如何变成半自耕农,看他如何变成佃农,变成佃

工,看他如何自然而然的完全破产。”那四口之家的两个孩子,“假使是一男一女,那么女的出嫁,男的讨媳妇,还不致于扰乱人口的平衡。”“假使第一代所生的是两个男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两个媳妇进门,便从四口之家一跃成为六口之家。倘使公公婆婆能见孙子面,便再跃为八口、十口之家。”“于是必须租地主之地才能图存。这样,一个自耕农家(因兄弟分家)便成了两个半自耕农家。”

半自耕农的负担比自耕农自然是重一些,他要缴田租“在(旧)中国,这田租是很重的。”半自耕农之家“必定有冻饿之患。”“这半自耕农不久便再而变为佃农了。”

“佃农更苦,讨得起妻子,生不起儿子。儿子生不起,还是依旧一个个的生。借债扶养,……随时可以变成长工、短工、散工,统称之为佣工。这佣工的儿子便是光棍一个,连老婆也讨不起了。”

陶行知对这个自耕农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之后,感慨非常地说:“想那四口之家,终身信着多福、多寿、多男子,哪知道一男一女倒能维持小康的家道;两个儿子反要弄得家散人亡,甚而至于绝种。”

陶行知分析的是四口之家的自耕农,而当时“中国农家人口平均不是四人,而是五人以上。在这情形之下,大家仍旧抱着多福多寿多男子的迷信,闭起眼睛来生孩子,那么今日之自耕农便是明日之半自耕农,后日之佃农,外后日之佣工。”这样继续下去,“不必外来的力量,中国的农村便是这样的崩溃。”由此可见,陶行知对农村民众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之忧患是何等的强烈,他大声疾呼:“农民!农民!您仔细想想,还能闭起眼睛做多生主义的信徒吗?”

陶行知从分析一个自耕农入手,由小见大,由浅入深,入木三分地引出了中国人口问题,他指出:“这位老农如果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那么也用不着我们操心太过。可是他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他的命运,是中国人的命运;他的错误,是中国人的错误;他有出路,也就是中国人有出路。”陶行知把“中国耕地人口状况”、“中国人口数与生活状态”列出图表,分总人口、每人(土地)亩数、生活状态,划分创造线、教育线、无衣线、无食线、大乱线,加以分析对照。以大量的事实和足够的证据,得出结论:中华民族最根本出路就是“少生小孩子”,实行“科学生育”。

1931年8月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提出要“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

生、厚生、共生世界”,核心是“少生、优生”。1932年5月他在《古庙敲钟录》一文中,再次积极倡导“少生、优生”,他提出要“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陶行知在《答复子钵先生之批评》一文中,明确提出“人口统制”论,他高度概括:“人口统制是永久出路之一”。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计划生育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足见陶行知的人口论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见卓识。

由于国情和历史的局限,在20世纪初,明确提出人口统制,节制生育的论述,并指出中华民族最根本出路是“少生小孩子”、要实行“科学生育”确实要有过人的胆略和气魄。陶行知自己也申述“历史上还没有人口统制这么一回事”。所以说陶行知是中国人口问题的拓荒者,是有足够事实依据的。

## 二、批判多生主义的急先锋

在陶行知探讨中国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充满着丛丛荆棘和激烈斗争,但他坚持真理,坚信科学,坚定信念,坚决与多生主义及其鼓吹者作斗争。

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者还主张以增加人口来保存民族、发展经济,竭力倡导和鼓吹多生主义,陶行知从民族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与多生主义开展斗争。1932年5月21日,陶行知在《申报》发表了《古庙敲钟录》长篇文章,文中就“生得少”问题与多生主义者展开论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多生主义鼓吹者的要害:“现在中国受了帝国主义压迫,正要奖励生聚,运用伟大人口力量去抵抗,何能教人少生孩子,以自减国力?”他们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1931年初,陶行知流亡日本时,读到胡适发表在《新月》上的《我们走哪条路》一文,在文中,胡适说到“五鬼闹中华”,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人口问题却只字不提,一笔勾销,陶行知忍不住写下一首讽刺幽默的小诗,奉送给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陶行知在《胡适捉鬼》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田不够种,工不够做,饭不够吃;因为多生所以穷;因为多生所以有病不能医;有子女不能教;因为大家多生所以穷亲戚多,穷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贫;因为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为

盗、为匪、称兵、构乱”。“其实，帝国主义总司令也是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场。世界最大乱源便是多生主义。这个妖怪不除，世界哪能太平，中国哪会有出路？”

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生尚仲衣，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于1934年9月29日在天津《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专栏上，用子钵的笔名发表长篇批评文章，题目是《陶行知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吗？》副标题是《陶行知主义人口统制论之批判》，公开向陶行知的人口论提出挑战。子钵先生认为，陶行知的人口统制论不是中华民族之出路。陶行知于1934年12月12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答复子钵先生之批判》，后来刊登在1935年1月14日天津《大公报》同一副刊上，题目改作《子钵先生捉虱子》，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点。他说：“子钵先生是搜罗了许多数目字来证明我们的理论不对，……我把他所举的数目字仔细审查了一番，觉得每一个正确的数目字都是我们理论的楼梯，或是我们理论的注脚。每一个正确的数目字都证明中国人需要人口统制——不可乱生小孩。”“子钵先生要否认人口增加为每家耕地缩小原因之一，必得证明地球无限大或中国新兴工业进步容量超过中国人口之增加。”“子钵先生言外之意好像我们有剥夺农人生育权之嫌疑。这断不是我们的主张。”陶行知义正辞严地质问子钵先生：“当您遇着一个生过两个孩子而只够糊口的女工，倒在弄堂门口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您如何指导她？”“当您遇着一个生过十个孩子只剩两个的农妇，卧在田里生第十一个孩子的时候，您又怎样去忠告她？”陶行知就是这样以满腔的正义和辛辣的语言抨击多生主义的鼓吹者，捍卫和维护统制人口、节制生育的正确人口理论。

陶行知在许多重要论著中严厉批判多生主义，他在《出路》一文中指出：“多生主义的信徒把中国人弄得田不够种，工不够做，饭不够吃，衣不够穿，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这叫做种族之积极的自杀。”陶行知不仅坚决反对多生主义即种族之积极自杀，而且坚决反对不愿生育即种族之消极自杀，“对于消极、积极的自杀政策，都是反对的。”他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严厉痛斥：“暴虐者不得以藉人口多而惨加屠杀。”他重申：“我们必得在这里说明我们的本意，使大家对于我们的主张没有丝毫的误解。”

### 三、综合治理人口的探索者

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陶行知忧患满怀，激情

难捺。他大声呐喊“中国之弱、弱于人多”。要实行“科学生育”，推进“人口统制”综合治理人口问题。

1931年，陶行知在《出路》一文中，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一)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发一人口总退却之紧急命令，教男子满二十五、女子满二十岁结婚。结婚后服务五年，可生第一子，俟第一子入小学，可生第二子。以二子为限。子为男子女子之通称。一胎生二子或三子者，以一胎为限。

(二)设避妊研究所。要发明一个铜子的避妊法，使全民族都用得起，普遍实行。

(三)避妊之普遍的宣传，应成为民众教育最大之职责。医院及注册的医生，对于国民避妊之询问，应免费指导。

(四)宣传结婚前配偶之科学选择，以便优生优育。

(五)男女双方都应赞成少生主张，实行避妊。对阻碍避妊的男子，一方面由教育劝导，一方面用法律限制。生孩多于二人，宜处男子以危害国家之罪。

(六)宣传科学上男女有同等之遗传力，故有女即有后。

(七)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组织一永久人口升降委员会，随时调查耕种土地面积之消长，生产技术之进退，生活程度之高下，容纳人口出路之多少，以改定人口升降之比例，……。

陶行知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七条措施之所以说是科学的，是因为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陶先生提出的七条办法措施条条符合现行的人口政策以及地方性计划生育条例和法规，充分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表现了它的科学性。第一条就是全民动员，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符合生第二孩的夫妇必须有一定的间隔期；坚决杜绝多胎多孩。第二条就是坚持避孕为主，落实节育措施。第三条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生理生殖生育服务。第四条就是加强婚前教育、提倡优生优育。第五条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丈夫有责，并呼吁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人们的生育行为和违法超生应负的法律 responsibility。第六条提倡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第七条建立组织，明确职能，确定人口目标任务。这些都是我国现阶段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必须长期坚持的致胜之道。

1934年，陶行知在《答复子钵先生之批评》一文

中,指出“我们所提出的建议是人口统制,无论什么人都要受人口升降委员会的制裁。”“人口升降统制委员会应是一个永久的组织。这不是一个暂时缓冲的策略。”他同时强调“以地域而论,人口升降委员会可以颁特殊条例,允许人口稀少之边疆的人民,每人多生几个孩子。”在1935年1月发表的《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陶行知再次重申“人口稀少之地带,由人口升降委员会颁布特殊条例”,这一措施正是目前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也说明了陶行知在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才能取得成效。这也是陶行知人口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出路》一文中指出:“教人少生小孩子,是少数人干得起来的吗?少数人可以发起,但是他发生力量必得全民族起来互助。全民族家家都实行节育。”“特别是这人口问题,必须由世界各国同心合力的来解决,才能有彻底的办法。”“全世界的人们都要彻底觉悟,大家在一块商量一个少生小孩子的办法。”“我愿全世界的老百姓一齐起来,共同提倡少生,别给政客们把你哄骗了”等等。

对于控制人口增长,必须辅之必要的政府行为和行政手段,陶行知也是赞成的。他在《出路》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教人少生小孩子与教人创造富的社会这两件事的效力,一部分要靠政治的力量。政治立在民众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大家觉得政治是自己的事,必是拼命的拥护,这力量必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否则,政府与群众关系紧张,民众非积极的对抗,则消极的不合作,必不能发挥出力量来。”陶行知这番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十分明白,控制人口增长,必须依靠组织和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使人口政策深入人心,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发生巨大的力量。否则,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控制人口就会受阻碍,成效就不会显著。陶行知的真知灼见,发人深思,发人深省,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

#### 四、人口教育的实践者

陶行知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人口论是他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人民教育的伟大实践中,认真实践他的人口教育。

在《出路》一文中,陶行知的又一精辟论断是:

“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小孩子。”他说:“我们从前因为过庶,所以贫穷;因为贫穷,所以愚蠢;因为愚蠢,所以过庶。结果愈庶愈穷,愈穷愈愚,愈愚愈庶。少生小孩子,可以打破过庶之害。……使人民愈富愈智,愈智愈富。”

1931年8月,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把培养生活力归纳为70种,要用70种活的、真的、动的、有用的教科书,其中第62种为生育,要用生育指导书;第63种为节制生育,要用节制生育指导书;第70种为创造五生世界,要用创造五生世界指导书。

1932年5月,陶行知在《古庙敲钟录》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应该同时受六大训练才能渡过难关。这六大训练是:

- (一)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
- (二)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
- (三)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
- (四)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
- (五)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

(六)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陶行知解释:“为什么要加上这生育的训练?‘生得好’当然人人赞成,谁愿意生坏孩子呢?至少‘生得少’三个字……自己在人口问题上去搜集事实,让这些事实自然而然的唤出主张来。”他在1934年11月发表的《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一文中再次强调要实施“普遍的生育训练”。

1935年,在《普及现代生育教育出路》一文中,陶行知明确提出要“破多生关”,才能普及现代教育,把人口教育作为现代文明,“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这过分的人口增加也得要统制。”再次重申把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办法和措施贯穿到教学中去。

#### 五、少生快富文明的推进者

陶行知的人口思想不是孤立的、片面的,他注重实践、注重实际,不断掌握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

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理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陶行知人口论的思想基础。陶行知在《出

路)一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有三条:一是少生小孩子;二是创造富的社会;三是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

在《答复子铎先生之批评》一文中,陶行知进一步指出:“这三条出路是一套连环的出路。少生几个孩子便可以多做些创造工作,多做些创造工作便可以多得一点平等地位与人互助,而这种平等互助又可以叫你放心大胆少生几个孩子。”

陶行知这一论断言简意赅。人口生产要降,物质生产要上,有效地控制人口就是为了更好地创造财富,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创造文明幸福的生活,从而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陶行知的“三条出路”论述就是“少生快富文明工程”,也就是计划生育“三结合”的雏形或最初表现形式。

陶行知言行一致。他一生全神贯注地为他提出的中华民族三条出路而努力实践。为了教人少生小孩子,他奔走呼号,探索出路。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陶行知在《出国二十六国日志》中记载,多次在世界论坛上阐述中国人口问题。1937年11月,陶

行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剧院演讲《人口问题的剖视》。193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师范教育年鉴上,陶行知就中国人口问题发表文章,坚持了他在人口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为了教人创造富的社会,陶行知率先垂范,躬身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现代教育,向广大民众传播科学知识,传授生产技术,谋求科教救国、振兴中华。为了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陶行知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称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信仰共产主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他的许多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陶行知通过大量实践形成的人口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辩证地评判陶行知的人口观,学习和认真实践陶行知的人口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 欢迎订阅 1999 年 西北人口

携手共进砥砺思想 全方位分析中国当前人口发展热点问题  
突出特色继往开来 多层次探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前景

《西北人口》是全国创办最早的人口学期刊之一,是国家级综合性人口理论核心期刊。

《西北人口》坚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发表新观点、发掘新课题、发布新信息、提供新知识。着力务实、力避空论,提倡有创见性地探讨我国当前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力求反映和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期对我国的人口控制具有真正具体的指导作用,为我国计划生育和人口科学的深入发展与繁荣服务。

《西北人口》竭诚为广大读者、作者服务,力求以高品位和高质量使她成为人口理论工作者的学术园地,成为各级党政领导进行人口决策与管理的参谋助手,成为人口科研工作者的伴侣,成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忠实朋友,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成为她的新读者,关心和支持她的发展与进步。

《西北人口》力求不断扩大信息量,使读者从既

定的篇幅中获得更多的新信息和新知识。

《西北人口》在办好“人口理论”、“计划生育”、“西北人口”、“民族人口”等栏目的同时,将着重加强“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生态”等重点栏目,使本刊能紧密联系我国当前人口发展与经济改革、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民族素质提高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并探索科学而实用的具体对策与措施。

《西北人口》将以更新颖的版式设计、更精美的印刷质量令您赏心悦目。本刊1999年彩色胶印,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定价4.20元,全年16.80元。国内邮发代号54—68。如果您错过了订期或在当地邮局订阅不到本刊,可直接向本刊编辑部办理邮购,每期4.50元,全年18.00元(含邮资)。

本刊地址: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  
邮政编码:730000 联系电话:0931-8912629